

MAKESI ZHUYI

YU ERSHI SHIJI DE ZHONGGUO

马克思主义 与二十世纪的中国

王 戎 熊 高 李本吉
郭瑞敏 邓群刚

编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MAKESI ZHUYI

YU ERSHI SHIJI DE ZHONGGUO

马克思主义 与二十世纪的中国

王 戎 熊 高 李本吉 编著
郭瑞敏 邓群刚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曾春宁
责任校对:蒋姗姗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李 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与 20 世纪的中国 / 王戎等编著.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1. 3

ISBN 978-7-5614-5206-6

I. ①马… II. ①王… III. ①马克思主义—发展—研
究—中国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30093 号

书名 马克思主义与 20 世纪的中国

编 著	王 戎 等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5206-6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9.5
字 数	265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
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www.scupress.com.cn

目 录

第一章 民族危机与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1)
一、19 世纪末的中国社会·····	(1)
二、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与历史主题·····	(6)
三、对国家出路的艰辛探索·····	(11)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	(33)
一、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	(34)
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40)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52)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69)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的兴起·····	(69)
二、国民革命的成功与失败·····	(81)
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步运用·····	(89)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革命新道路·····	(98)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内政外交·····	(98)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展开·····	(106)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历程·····	(127)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全民族抗战·····	(138)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138)
二、坚苦卓绝的全民族抗战·····	(146)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走向成熟·····	(161)
四、抗日战争的胜利·····	(171)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与新中国的成立·····	(176)
一、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的努力·····	(176)



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	(181)
三、马克思主义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194)
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206)
一、马克思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社会·····	(207)
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219)
第八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与改革开放、 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235)
一、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前进·····	(236)
二、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252)
第九章 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的中国乡村建设·····	(261)
一、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三农问题”·····	(262)
二、马克思主义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 “三农”问题的理论与实践·····	(266)
三、马克思主义与集体化时代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的理论和实践·····	(273)
四、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新时期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284)
五、结语·····	(292)
主要参考文献·····	(298)
后记·····	(302)

第一章 民族危机与 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创造了举世闻名的灿烂文明，曾长时期走在世界前列。但由于封建统治的腐败和束缚，中国渐渐从先进转为落后。1840 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性质发生重大变化，泱泱中华帝国的古老大门，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英国、法国等列强纷至沓来。从此，中国由“天朝上邦”沦为列强宰割的对象，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除了遭受残酷的封建压迫外，更遭受了资本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在这样的情势下，中国开始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数志士仁人为挽救民族危亡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一、19 世纪末的中国社会

中国本是人类历史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同古埃及、古印度和古巴比伦一起被誉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拥有独特的、高生产效能的农业基础，一直到 18 世纪，就平均亩产量、发达的水利系统以及技术水平等方面而言，都遥遥领先于世界；而组织严密的官僚机器、发达的商业组织、繁荣的地方商品市场、都市的规模和数量等，也都远远高于当时的欧洲水平。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等人列举过中国创造的 100 个世界第一，指出现代文明赖以建立的基本发明约有一半来自中国。除了让世界惊羡不已的指南针、火药、造纸以及活字印刷术之外，中国还有世界古代史上最发达、最完善的农业耕作和灌溉体系，以及不胜枚举的实用科技发明。造纸术的发明为人类的文化传播、思想交流和科学发展，提供



了至今仍不可缺少的信息存贮和传递手段。印刷术的发明，开创了书籍的历史新纪元。中国的雕版印刷术在公元8世纪传到日本，14世纪从伊朗传到埃及和欧洲。活字印刷术大约在14世纪传到朝鲜和日本，15世纪传到欧洲。从此，欧洲近代科学迅速发展，为资产阶级的兴起和思想文化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曾经这样评价：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三种东西已经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而马克思则评价：“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①

中国文明广泛影响着世界，除向东直接影响朝鲜、日本外，还经过陆路和海路向西、向南传播。陆路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它既是一条商业之路，也是一条文化之路，将中国古代文明远播西亚、北非、欧洲，再从欧洲流传到美洲和大洋洲。海路从东南沿海出发，经过台湾海峡，进入东南亚各国，然后穿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向西更到达阿拉伯半岛的非洲东海岸。

但是，从16世纪起，东、西方的发展出现了巨大的分野。伴随启蒙运动、文艺复兴等伟大的思想解放潮流，欧洲的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获得迅猛发展。摆脱了王权压抑、束缚的城市纷纷出现，现代司法体系、议会制度逐步确立，在对抗上帝的权威中人的尊严凸显，人对自然进行掌控的主体的地位得到确认，对自然的探求和征服进一步推动了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工业革命则使得生产力惊人的提高。仅18世纪5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期间，英国纺纱业的机械化，使单个生产力提高了300至400倍。在1800年，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产量中的份额为33.3%，而到1900年则下降为6.2%。中国与西方在发展上的差距被工业革命陡然拉开。李约瑟在其7卷本、2000万字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7页。



难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李约瑟的结论是：过去两千年中国存在着一个封建官僚制度。所谓“封建”是指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到皇帝手中，所谓“官僚”是指皇帝直接管理官员，而不是像古代欧洲一些地区那样，通过贵族阶层来管理。这种制度产生了两种效应，正面效应是：通过科举制度的选拔，可以使中国非常有效地集中了大批聪明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的管理使得中国井然有序，并使中国发展了以整体理论，实用化研究方法的科技。例如，中国古代天文学取得了很大成就，其观测数据至今仍有借鉴价值，再如大运河的修建等。负面效应是：“封建官僚制度”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使得新观念很难被社会接受，科技发展的阻力巨大。与之相应，马克斯·韦伯曾致力于研究儒家伦理与中国资本主义精神阻力之间的生成关系。在其著作《儒教与道教》中，他的最终结论是：儒家伦理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则在其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指出：“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其财富也许在许久以前已完全到达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有的限度，但若易以其他法律，那么该国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可允许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的多。”^①中国的专制制度限制了中国财富的增长。

儒家伦理的基础和核心是专制主义。李大钊曾说：“孔子是专制主义的护符和灵魂。”自秦汉以降，总的趋势是专制主义君主集权政治愈演愈烈，明、清时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明太祖朱元璋废除沿袭千年的丞相制度，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皇帝成为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集军、政、财、文化大权于一身；虽设立内阁，组织形式和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阁近似，然而实质却完全不同。现代的西方内阁是议会政治的产物，它的权力相当庞大，除了偶尔受议会制约外，不受其他限制。明代的内阁便完全是两回事，

^①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书馆 1972 年版，上卷，第 88 页。



内阁成员完全由皇帝任命，整个内阁只是皇帝的秘书厅，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的秘书。内阁权力的大小取决于皇帝执政能力和权力欲的大小，即使在内阁权力相当庞大的时候，仍受到君主权力的制约。任何权重的大学士，在皇帝下诏斥逐以后，当日即须出京，不得逗留片刻。清承明制，发展了明代的绝对皇权，又强化了严酷的民族压迫。这种帝王的集权专制，在当时世界上是罕见的。日本中世、近世的天皇，地位类似欧洲的天主教教皇，不掌实权，不负实责，实权在征夷大将军手中。欧洲中世纪，政权与神权是分治的，政权归国王，神权属教会。欧洲谚语“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说的就是欧洲政教分离，思想文化大权游离于王权之外。即使在中世纪晚期欧洲皇权极盛时期，掌管神权的教会对君主仍有着强大的制约力，王权须获得神权认可，国王必须经过教皇加冕才能获得合法性；加之中世纪晚期市民社会的崛起，不少城市从王权的控制之下摆脱出来，使得欧洲的专制王权颇为有限。故封建一词在中国与在西方的内涵是不同的，在中国意味着专制、集权，在西方则意味着分权。韦布斯特的《新国际词典》（第三版），这样定义作为一种政府类型的封建主义：“政治权利被看成一种私人权利，被一群领主分别拥有。”勒恩则说：“封建主义就是一种极端的在政治上没有中心的社会状况，在那时，我们今天所谓的公共权威是被一些个人分散拥有的。”^①中国则不然，皇帝在宗教教主之上（由皇帝向宗教领袖颁发金册），又通过科举考试，皇帝成了天下士子的老师（殿试便是士人直接到帝王面前应试）。皇帝集政治、神权于一身，这使得中国的君主专制失去了有效的制约机制，其为祸社会的一面便无法遏制。

在中国文化史上存在一个突出现象，即专制君主监视和控制知识分子的思想动态，唯恐扰乱了统治秩序。这种情形到了明、清时期发展到苛酷的程度。即使与欧洲中世纪黑暗时期臭名昭著的宗教

^① Rober: E Lerner/Standish Meacham/Edward Mcnall Burns, *Western Civilizations* Volume I, II Edition. w. w. Norton & Company. INC1988, pp317.

裁判相比，明、清文化专制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故鲁迅将明、清时期的文字狱喻为“脍炙人口的虐政”。明、清两朝大兴文字狱，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桎梏。明初文字之祸的主要危害是对思想的钳制。慑于皇权淫威，大量读书人不敢发表己见，因循苟且，无所作为。潜邱《札记》指出：“予尝发奋太息，三百年来学问文章，不能上追汉唐，下及宋元。”清代文字狱造成的恶果比明代更为严重。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清初文字之狱，绵亘顺康雍乾四朝……四朝之法禁既严，一代之文人胆殒。人咸说四库馆开，为昌明文运，又孰知顺治季年以来，文人固战战兢兢，无日不在恐怖之中也。”^①明清之际，由于社会格局的巨大变化，萌发了具有启蒙精神的社会思潮和带有若干近代色彩的自然科学。由于中国文化专制主义的粗暴干预，读书人无不提心吊胆、避祸自保，无人敢言社会问题，直接导致思想领域的僵化沉寂。据钱穆称，清初吕留良、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本有一定的思想交流，形成时代共鸣，“当时诸儒于政治原理上颇多感慨发明”，遗憾的是，“其后清廷屡兴文字之狱，此等理论乃绝”。^②他们的著作都触犯时禁，流传不广，虽光芒耀眼，却一闪即过，终归于沉寂。在这种政治高压之下，考据学遂在清代中期兴起，风靡一时，成为显学。梁启超评论：凡当主权者喜欢干涉人民思想的时代，学者的聪明才力，只有全部用去注释古典。欧洲罗马教皇权力最盛时，就是这种现象。我国清代雍、乾间也是一个例证。^③致使龚自珍发出“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万马齐喑究可哀”的长叹。

政治专制，社会闭塞，以及因文字狱肆虐而导致的文化扭曲，构成阻滞中国社会发展、科学文化进步的严重障碍，拉大了中国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正如有学者所说：文艺复兴之后，欧洲知识分子冲决了教会的桎梏，纷纷探索新问题，各种新思

① 陈登原：《国史旧闻》第3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57页。

②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93页。

③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



想、新学术骤然兴起，出现了一个生气勃勃的崭新局面，自然科学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我国清代的考证学派尽管对古典科学著作的整理作出了一定贡献，但这是由于封建专制文化政策造成的，知识分子的注意力被引入对于古籍的整理；而知识分子对于新事物的探索，或缺乏勇气，或不感兴趣。考据学花费的心血令人赞叹，但知识分子钻进故纸堆却是造成学术文化以至自然科学与欧洲相比越来越落后的原因之一。^①

二、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与历史主题

16世纪以前，所谓的世界历史是各大洲分别讲述的历史，世界各地包括亚欧大陆的东、西方，只依靠几条断断续续存在的内陆商道和接驳转运的海运航线相联系，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并不密切。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② 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结果”是在15~16世纪，经过一系列重大变化才出现的。在西欧，葡萄牙首先发起了大规模的航海探险活动。15世纪早期，航海家恩里克王子创办地理研究机构，为取得黄金、象牙和奴隶，组织了多次非洲西海岸的探险活动，先后发现了马德拉岛、佛得角群岛，并从直布罗陀沿非洲西海岸到达几内亚湾。1473年，葡萄牙船只驶过赤道，后到达刚果河口；1487年，迪亚士的探险队到达非洲南端，发现好望角，并进入印度洋；1497年，以达伽马为首的船队沿迪亚士航线继续向前，经非洲东岸的莫桑比克、肯尼亚，于1498年到达印度西南部的卡利卡特，开辟了从大西洋绕非洲南端到印度的航线。在葡萄牙人探寻新航路的同时，西班牙统治者也极力从事海外扩张。哥伦布发现美洲，就是这种扩张的最重要收获。1519年，麦哲伦率船队，从西班牙的桑卢卡尔港出发，完成环球航行。新大陆和新航线的发现、16世纪初具规模的世界市场的萌芽，使得东、西方的联系从偶尔、稀

① 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册，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3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页。

疏发展为经常、密切。直到此时，世界历史才从分散隔绝的发展进入到整体的发展。随着世界整体的发展，东、西方之间互不依存的然而平等的关系的结束，已是近在咫尺了。

资本主义时代从16世纪开启，这时西方资本主义正处于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殖民主义是资本原始积累最重要的手段之一。马克思说：“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的征服与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的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① 这段论述精辟地概括了殖民主义对美洲、非洲、亚洲掠夺的内容及其对资本原始积累的贡献。从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西方殖民主义的主要特征，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的赤裸裸的劫掠。他们带着火和剑来到东方，留下的是用泪和血的文字写出的历史。

（一）帝国主义的侵略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是近代中国的历史开端，也是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转折点。

鸦片战争是因英国向中国走私鸦片而引发的。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历经了工业革命之后，英国已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工业大国，有着对外殖民的强烈渴望和推销不完的商品，在巩固了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和占领了新加坡之后，转而积极向中国扩张。英国打开中国市场，最初采取的是商品输入的方式。英国的布匹、羊毛和印度棉花是对华贸易的基础。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处于严重逆差地位，直到19世纪，它仍以美洲白银来补偿这种失衡。英国试图扩大商贸往来以挽回局面，遭到中国方面的拒绝。从1757年起，中国沿海只准广州一口对外通商。1793年，英国女王特使马嘎尔尼来华，想直接同乾隆皇帝商量扩大对华贸易，但却没有达到目的。1816年，英国派阿美士德到北京，想同中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被拒绝，清政府下令不准以后再有外国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19页。



使臣入京。1834年，英国政府派诺斐尔为驻中国贸易监督，到广州想同两广总督建立直接联系，也遭到拒绝。英国用工业品打开中国大门的做法，没有获得成功。为挽回赤字，东印度公司鼓励印度种植鸦片，并将其走私到中国牟取暴利。鸦片成为当时对华贸易中唯一赚钱的货物，英国为此获得巨额收益。

鸦片走私给中国方面造成严重后果。在1835年之前，中国已经为鸦片进口支付了巨额白银，相对其他商品的出口所获，为鸦片而支付的白银成了导致晚清政府银贵钱贱的财政危机的重要原因。1835年，中国至少有200万鸦片瘾患者，而至最高峰时的同治年间高达4000万人，占当时中国人口的1/10。到1840年前，鸦片在中国的如此流行，以至于林则徐认为：“烟不禁绝，国日贫，民日弱，十余年后，岂惟无可筹之饷，抑且无可用之兵”，“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①当中国政府发现鸦片走私的严重后果厉行禁烟时，英国开始鼓噪对华战争。尽管英国反对党议员威廉·格拉斯顿深知这场战争是邪恶的，并在议会坚决反对，“这场战争从根本上就是非正义的，将让这个国家蒙上永久的耻辱，这种耻辱是我不知道，也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我们的国旗成了海盗的旗帜，她所保护的是可耻的鸦片贸易。……我担心，因为英格兰对中国的种种恶行，上帝将降罪英格兰。”^②

但鸦片贸易的利润实在太丰厚了，太具有腐蚀性了，完全没有动摇英国政府发动战争的决心。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由四十八艘舰船和四千余名官兵组成的英国远征军封锁了广州珠江口，鸦片战争揭开战幕。在林则徐的指挥下，广州军民严阵以待，英军见无可乘之机，遂北犯厦门，也未得逞。最终北犯并攻陷浙江定海。清政府于1841年1月对英宣战，次月，英军攻占虎门炮台，

① 林则徐：《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端片》，《林文忠公政书》2集，卷五。

② [美]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著，周辉荣译：《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三联书店2005年版。

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战死。同年夏秋，英军继续扩大战火，先后攻陷福建厦门，浙江定海、镇海和宁波。1842年，英军攻陷吴淞口炮台，守将陈化成战死。之后，英军一度侵占上海、宝山，又闯入长江，攻陷镇江，切断京杭大运河南北交通，继而直抵江南重镇南京城下。同年7月24日，清政府在英军的炮口下，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赔偿二千一百万白银元，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口岸城市对外通商；此外，英国还享有协议关税权。通过《南京条约》补充文件《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的签订，英国又得到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和开设租界等特权。

在英国以暴力为后盾，不断扩大对华商品倾销和侵略权益的同时，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效法，中国的国家权益遭到严重侵害。正如吉尔伯特·罗兹曼所指出的：1842—1895年间，英、法、日、美、俄等列强先后对中国发动了多次侵略战争，中国的主要沿海城市和内河港口都向外国敞开了大门，先后开放的港口和通商口岸的数目逐渐增加到将近一百个。各国都获得治外法权，意味着外国法律到处适用于外国人。最惠国待遇意味着中国只能与所有缔约国进行一揽子式的谈判，成为外国人在中国攫取特权的利器。根据通商条约，中国关税大都固定在商品价值5%的水平上，这意味着中国无从控制其贸易，也不能保护自己的新兴工业。《马关条约》增添了外国人在通商口岸地区建立工厂的权利，这就可以使外国人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甚至连向外来货物征收的低额关税都避开了。清政府的海关、邮政、盐税机关都由外国人充任其职（用这些单位的收入来抵押外债）。19世纪末又加入了允许外国使馆设防的条款，从而使得心地殊异的外国驻军军官积累了在中国进行实战的经验，日本战略家石原莞尔就是其中之一。^①列强对中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控制伴随着侵略战争日益加深，而中国则一步一

^① [美] 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30页。



步地从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

（二）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

近代中国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进行利益争夺的矛盾等等交织在一起。但在众多矛盾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则是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孙中山于1894年11月在创立革命团体兴中会时指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故摆脱帝国主义压迫，争取民族独立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第一步。而封建主义尤其是封建地主阶级则是中国专制统治的基础，是阻碍中国内部革新、走向政治与经济民主化的内在障碍，不消除之则中国的现代民族工业难以发展，现代中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无从建立。近代中国革命就是在两个基本矛盾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近代中国的两大历史任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两个任务是相互区别又相互紧密联系的。由于腐败的社会制度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阻碍着经济、技术的进步，必须首先改变这种社会制度，争得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才能为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创造前提，开辟道路。因为不经过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争得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就不可能推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反动统治，改变他们控制中国经济、政治命脉，利用特权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和资本输出，压迫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局面；就不可能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专制政治制度，解放农村生产力，改善农民的生活，扩大民族工商业的国内市场；就不可能达到民族的团结、社会的稳定，从而集中力量进行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现代化建设，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富裕幸福。诚如毛泽东所言：“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

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①民族独立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工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都等于空谈。

三、对国家出路的艰辛探索

中国近代史，既是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勾结中国封建统治者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史；也是中国人民不断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反抗本国的封建统治的抗争史；同时更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政治派别探索国家出路的探索史。这种抗争与探索，对外以反侵略、捍卫民族独立为旗帜，对内以反专制独裁、争取社会进步为核心。抗争与探索互相交织，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随着外国入侵，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加深，社会各阶级都面临着“怎么办”的问题。从农民群众，到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到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从各自的阶级立场出发，对国家的出路进行探索，先后提出了自己的政治改革主张和方案。但是，无论是农民阶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还是资产阶级的维新变法、辛亥革命，都无法实现中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这些探索先后以失败告终。

（一）太平天国

鸦片战争之后，五口开埠通商，外国的工业产品大量涌入中国，精美廉价的工业产品，使中国传统的家庭副业和手工业遭到巨大冲击，东南沿海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失去生计。为偿付大笔军费和巨额赔款，清政府的捐税年年增加，农民难堪重负。1840—1850年，广东、广西和全国许多地区，水灾、旱灾、蝗灾连年不断，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民间愁苦在积累中化为躁动。龚自珍曾预言“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终于，1850年末爆发了洪秀全领导的大规模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①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981页。



洪秀全（1814—1864），广东省花县人。洪秀全走上起义道路，和他所处的时代、生活环境、个人际遇是分不开的。和许多读书人一样，他曾打算通过科考走上仕途；但是，屡试不第，他满怀忧愤，产生了对现实的强烈不满。1843年，洪秀全最后一次科考失意，绝了“学而优则仕”的前途，对儒学也失去了希望。读了传教士所送的《劝世良言》，感到基督教教义宣传的平均、平等观念很合自己的口味和需要。于是，洪秀全假托自己是上帝次子、耶稣弟弟下凡救世，宣称皇上帝为唯一真神，其他诸神都是妖邪，创立拜上帝会。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金田正式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太平天国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该制度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否认一切私有财产权，规定了废除一切私有制的总原则：“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实行土地平均使用制；规定凡16岁以上的男女均可分田，15岁以下减半，好田次田搭配，绝对平均。农民的农副产品除自用外，均缴“国库”，力图实现“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这种规定既否定了豪富缙绅的大地产，也没有保留北魏或唐初“均田制”中官吏“俸田百顷”的旧例，而是“普天下皆一式”的平均主义方案。《天朝田亩制度》的颁布，反映了农民千百年以来渴望得到自己一份土地的根本要求，而且以磅礴的气魄、明确的主张规定下来，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空前的。

《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后期颁布的社会发展方案。1859年，洪仁玕从香港来到天京，被封为干王，总理朝政。不久，他提出了一个统筹全局的改革方案——《资政新篇》。它的主要内容是：在政治方面，主张“禁朋党之弊”，加强中央集权，并学习西方，制定法律、制度；在经济方面，主张发展近代工矿、交通、邮政、银行等事业，奖励科技发明和机器制造，尤其是提出“准富者请人雇工”，对穷人“宜令作工，以受所值”，这就把向西方的学习从生产力的领域扩展到生产关系的领域，即开始提倡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了；在思想文化方面，建议设立新闻官、新闻馆，破除陈规陋俗，提倡兴办学校、医院和社会福利事业；在外交方面，主张同外